

4709

大悟文史資料

第八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大悟縣委員會

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大悟县文史资料

主 编	陈春田	
副 主 编	杜清江	
责任编辑	李贤国	
编 辑	李贤国	幸 毅
	李晓东	李 华新
	夏安民	刘福群
校 对	刘善银	幸 毅

1990年10月

发扬
是
征精神

振
兴
大
悟
任
介

汪昌猷

一九九六年
十月七日

以史为鉴

开拓未来

李海华

九六

前言

1936年10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大会师。至此，举世瞩目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毛泽东同志说：“长征是历史纪录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开始。

1996年10月是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回顾这段历史，缅怀革命前辈，对于继承和发扬革命光荣传统，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加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把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大西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留在鄂豫皖的红28军坚持了大别山三年的游击战争，从战略上配合了红军长征。

大悟县是鄂豫皖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徐向前、张国焘、陈昌浩曾中生、旷继勋、许继慎、蔡申熙、徐海东、李先念、张琴秋等活动的心腹地，是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篮。当年红军有在两万多人是从大悟地区出发参加长征的。红军不少高级将领是大悟地区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同志是大悟籍人，如徐海东、刘华清、程世才、陈海松、熊厚发、韩东山等同志，他们的战斗事迹在长征路上，在大悟山区人民群众

中至今还广为流传。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我们采用以历史为经，人物事件为纬的征编方法，搜集整理了长征史话、人物传略、战斗故事、名人轶事等史料汇编成辑，呈献史林，以告慰先烈，启迪后人。

另外，为了全面反映大悟地区的历史，我们还编辑出版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科技、文化艺术、教育卫生、统战人物及名山关隘等方面的史料，体现了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特色，以求使本辑文史资料更为丰满。

全书选登作品37篇，计15万字，题材广泛，史料翔实，内容新颖，可读性较强，富有真实性和感染力。

至此，我们谨向关心、支持本辑编撰出版工作的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谢！由于征编水平有限，对有的史料虽经考订，但因涉及的人物事件诸多，时间跨度很大，如有疏漏之处，尚希知情者和广大读者指正。

编 者

《大悟文史资料》第八辑

目 录

八千里路云和月

——红四方面军长征史话……………陈光旭 (1)

红旗漫卷西风

——红二十五军长征史话……………陈光旭 (17)

徐向前长征故事八则……………李贤国 川东 (28)

陈昌浩在长征中……………文 清 (40)

熊厚发长征西进甘孜

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秦 川 (49)

曾中生将军……………李贤国 (59)

徐海东抵制肃反扩大化……………陈光旭 (64)

许继慎将军……………李贤国 (76)

蔡申熙将军……………李贤国 (80)

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陈 文 (84)

红色娘子军女将

——张琴秋……………李贤国 (91)

徐向前悼念亡妻……………邓安成 (95)

徐向前在大别山区二三事……………陈义万 魏邦卓 (97)

双桥镇战斗·····	柳 雨	(101)
徐海东故事二则·····	邓安成	(105)
红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诞生始末·····	易俊民 柳雨	(107)
鄂豫边区革命烈士陵园·····	玉 泉	(114)
新四军第五师中原突围老战士访问记·····	丁木森	(123)
惨遭国民党杀害的国民党副旅长陈文钦·····	秦 川	(127)
和诗填词		
——加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	段昭明	(138)
旅台名人书法图影介绍·····	段昭明	(150)
潘静波·····	潘怀周	(153)
王胜泌·····	柳 雨	(155)
武汉《大刚报》的前前后后·····	潘怀周	(158)
大悟县板栗第一村·····	席荣旭 李邦源	(165)
大悟寿眉茶走向名牌之路·····	鲁述坤	(169)
泉水寨林场·····	詹清润	(175)
吕王镇石材开发前景好·····	张子吾	(178)
二郎店兴建县政府大院趣事四则·····	周志安 包德成	(180)
大悟一中选址建校的回忆·····	段昭明	(184)
山区园丁的摇篮		
——大悟县教师进修学校·····	李华新	(197)
我的母校的回忆·····	段昭明	(204)
医学世家·····	高仕俊	(211)
二郎店的沧桑·····	段昭明	(214)
二郎店考及其他·····	魏邦卓	(219)
鄂北三关今昔·····	魏邦卓	(222)
仙居顶·····	李御寰	(227)

八千里路云和月

——红四方面军长征史话

陈光旭

1936年10月上旬，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大会师的日子，已载入我国民主革命的光荣史册。它是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的标志，同时，又是中国革命的战略重心从南方移到北方，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过渡的重要里程碑。

从那时到现在，虽然过去了整整60年，我们今天纪念长征，仍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在长征中显示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自力更生、团结战斗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毅力，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不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是推动我们事业前进的巨大动力。

红四方面军是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组建、成长、壮大起来的一支红军队伍。它于1932年10月11日，从湖北省大悟县四姑墩撤离鄂豫皖开始西行，行程约五千里，到达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地区。这支部队从1935年4月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西渡嘉陵江起开始长征。先后转战于川西平原、川西北、川西南、西康东部及甘南地区。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流血牺牲，不畏艰难险阻，翻越数座雪山，三过草地，打破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有力地策应了一、二方面军的北上，为革命武装向大西北的战略转移做出了积极贡献。

从鄂豫皖到川陕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大革命失败后，在鄂豫边区党组织发动黄（安）麻（城）起义的基础上，吴光浩、徐向前、曾中生等先后将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武装扩编为红一军，以后又称红四军，于1931年11月，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辖第四军和二十五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这支红军在曾中生、徐向前等领导下，采取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鄂豫皖根据地人民的积极支援下，取得了反对敌人第一、二、三次“围剿”的重大胜利，红军发展到8万多人。

1931年5月，张国焘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大力推行王明“左”倾错误政策，使鄂豫皖地区的工作出现了很大的曲折。1932年夏天，国民党反动派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张国焘先实行“左”倾冒险，命令红军同敌人死拼硬打，使红军大伤元气；后见敌人的重兵入侵，他又惊慌失措，擅自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退却，放弃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转战到达陕西南部 and 四川北部。四川、陕西边界地区，地形险要，有党的工作和群众斗争的基础，红四方面军和当地人民群众密切结合，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艰苦创业，建立革命政权，扩大革命武装，发展党的组织，实行土地革命，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先后粉碎了四川军阀田頌尧、杨森、邓锡侯等的多次进攻，特别是1934年9月，红军取得了粉碎四川军阀刘湘组织的20万人的六路围攻，俘敌2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这时，红四方面军已发展到8万余人，共有第四、

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等5个军。川陕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人口逾500万，形成22个县市的革命政权。它严重危及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有力地配合了各根据地红军的反“围剿”斗争。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和作用，认为它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

1934年10月21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从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开始长征。到1935年1月，红一方面军已转移到川黔边。此时，急需红四方面军的策应。1月22日，党中央电令红四方面军全力西渡嘉陵江，在广大无堡垒地带机动作战，以策应红一方面军从泸州上游渡江入川。据此，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

3月28日夜，四方面军总部下发了渡江命令。位于苍溪以南塔子山附近的中纵队三十军，在李先念（军政委、红安人）、程世才（代军长、大悟人）、熊厚发（八十八师师长、大悟人）的率领下，首先强渡成功，席卷沿岸守敌。阆中以北的左纵队九军及苍溪以北的右纵队三十一军，亦相继突破敌江防线，向纵深发展。次日，第二梯队四军渡江，投入战斗。红四方面军各路部队如猛虎扑羊，横扫沿江敌人，取南部、克剑门，4月2日一举拿下天险剑门关，进而攻占昭化，包围广元，沿江400里的江防地段，均被红军攻占。是役历时24天。红军跨江而进，横扫直荡，先后攻占9座县城，歼敌12个团，共1万余人。

由于优势敌人联合压迫，导致根据地民穷财尽；由于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等原因，红军领导人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强渡嘉陵江后，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另寻出路，图存发展，

这就开始了越过万水千山、历经艰难险阻的长征。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是整个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军会师夹金山

1935年5月初，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准备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此时，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行动方针是：面进川西北，接应中央红军。

5月下旬，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奉命率领该军八十八师和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由岷江地区兼程西进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他们从汶川分路前进，一路由九军作先头部队向理县所属米亚罗方向前进。红九军于6月5日晨攻占两河口。

6月8日首先占领懋功（小金），歼灭守敌两个营，然后继占懋功东部之要镇——达维。此时，中央红军已到天全、芦山，正向宝兴疾进。两个方面军的前锋业已接近。

6月12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代表四方西军在理番致电党中央，详细报告了当前敌情和所属各部队位置，并表示：红四方面军全体同志，正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

红一方西军先头部队二师四团于6月12日翻过夹金山后，来到懋功县境的达维，与先期到达并驻守在达维镇上的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胜利会师。

1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达维镇，受到四方面军驻达维指战员的夹道热烈欢迎。当晚，两个方面军驻达维部队共同举行了胜利会师庆祝大会。毛泽东、朱德到会并讲了话。接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剧团为大会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全部到达懋功地

区。17日，毛泽东在懋功亲切接见了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军长程世才、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等同志，详细询问了红四方面军和川陕根据地的情况，指示了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当时，毛泽东把一幅军用地图平铺在地上，向他们详尽地分析了形势，明确地提出了会师后的方针和任务。他说：全国抗日高潮正在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一、四方面军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相互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明确指出：今后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毛泽东的话，象一盏指路明灯，照亮了红军继续前进的道路。

懋功会师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红一方面军3万人、红四方面军10万余人，两大主力会合后，总兵力共达13万余人，这就更加壮大了中国革命的力量和声势，扩大了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范围，为全国抗日高潮的早日到来和革命新局面的开创提供了条件。“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高潮就要到来。

北上与南下之争

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党中央与张国焘首先在战略方针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斗争。

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并制定了开创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新的战略方针。6月16日，中共中央将这一战略方针电告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6月17日，张国焘复电党中央，反对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提出向南、向西发展的退却方针，主张向川康边以及甘肃、青海一带发展，如有困难向南进攻。

6月24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懋功县的

两河口，受到当地驻军红九军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第二天，张国焘从杂谷垭红四方面军总部亦赶到两河口，受到党中央负责同志的盛大欢迎。

为了统一认识，消除分歧，进一步明确今后的战略方针，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了会议。会议经过争论，明确决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新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被迫表面同意了中央的决定。

6月29日，为了贯彻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精神，中革军委拟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利用胡宗南部初到松潘地区，兵力尚未集中，碉堡线尚未完成之机，消灭胡部，夺取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条通道，以利红军北出甘南。并且命令一、四方面军分组为左、中、右三路军和岷江支队，向北开进。

6月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中央红军从懋功两河口出发，向北部的毛儿盖挺进，于7月中旬抵达毛儿盖。

这时，胡宗南的二十七个团尚分布于汶县、松潘、平武地区，兵力分散，碉堡尚未修成。如果红军集中主力东进，将会迅速攻取松潘地区，顺利打开进入甘南的道路，从而免遭走茫茫草地之苦。但是，张国焘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的行动。

中共中央为加强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于7月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并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21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会议，与张国焘会商解决组织问题。几经周折，他才同意四方面军主力向毛儿盖集中。红四方面军到达毛儿盖后，张国焘又提出组织问题未圆满解决，再次拖延松潘战役计划，使红军在懋功和毛儿盖地区停留了一个半月之久。8月初，敌胡宗南发现红军企图

攻击松潘，北进甘南，乃将主力二十七个团集结在松潘、漳腊、南坪一线，凭险扼阻。追击中央红军的薛岳部，亦从川南北进川甘边，配合胡敌截击红军。敌前堵后追，企图将红军压入荒无人烟的草地，陷入不战而毙的绝境。

大敌当前，情势艰险，党和红军的团结，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但两军会合不久，这种团结便受到损害，并且发展到日趋明朗化的地步。

究其原因，主要是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和中央闹对立。同时，博古、凯丰等同志对四方面军横加指责，乱扣帽子，也起了不好的作用。他们不顾两军团结的大局，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等等，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这套“左”的做法，伤害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感情，也给了张国焘以挑唆的借口。

为了明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并解决由于张国焘破坏松潘战役计划而造成的危局，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6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再次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粉碎了张国焘篡夺党和红军领导权的企图。

此时，军委还在毛儿盖召开了军事会议，重新研究了敌情，对今后的行动方针进行了新的部署。会议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作战计划，红军主力改道经阿坝出夏洮流域，进据甘南。会上，徐向前和陈昌浩提议，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向一个方向突击。张国焘则主张，兵分左右两路北进。会议采纳了张国焘的意见，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以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率领，取阿坝，经墨洼，继出夏河，以一军、四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率领，穿越草地，出巴西、班

佑地区北进，万一无路可走，再改道经阿坝前进。彭德怀率三军、四军一部殿后，掩护中央机关前进。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战略行动方针。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部署，变右路军为北出主力；左路军为战略预备队，从阿坝地区东折，向右路军靠拢，共出甘南。

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右路军从8月21日相继出动，开始了征服草地的艰难进军。茫茫大草原，草深过膝，沼泽遍地，荒无人烟。气候乍寒乍暖，变幻无常，忽而骄阳高照，忽而雨雪交加。有不少绿草覆盖的泥沼，都是陷人坑，人和牲口掉到里面，越陷越深，直至被吞没。没有粮食，靠挖野菜、啃皮带充饥。红军指战员发扬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不为饥饿、疲乏、寒冷、暴风雨、伤病、死亡所屈服，万众一心，前仆后继，奋勇前进。经过5昼夜行军，终于穿过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

据侦察，离巴西、班佑不远的上下包座地区，有胡宗南部一团多兵力扼守，卡住我军北进的道路。胡宗南发现红军穿过草地，又急派其驻漳腊的伍诚仁第四十九师星夜驰援包座。该地处于群山之间，周围尽是原始森林，地势险要，碉堡密布，易守难攻。强占包座是红军的紧迫任务。

徐向前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交给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承担。毛泽东同意，具体作战部署是：以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十六团攻击包座南部的大戒寺；八十八师两个团及八十九师另两个团布于包座西北地区，相机打援；四军一部攻击包座以北的求吉寺，一军作预备队，并负责保卫党中央的安全。8月29日战斗打响，经3天激战，红四方面军歼灭包座守敌及援敌第四十九师，毙、伤、俘敌约5000人，缴获大批粮食、马匹、牛羊和军用物资，为红军北上援掉了一块最

大的绊脚石，彻底打通了北进的通道。

为集中兵力，火速北进，党中央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连电左路军，催其速离阿坝，横穿草地，向右路军靠拢。徐向前、陈昌浩还命四军抽出一个团，预备粮食、马匹、牦牛，以便前往草地接应左路军。可是张国焘变了卦，借口葛曲河涨水，部队缺粮，无向导，竟令已到达草地边沿的左路军停止前进，重返阿坝，准备南下。电报发来发去，毫无结果。北上和南下之争，成为关系党和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

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方针，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北进指示，9月8日电令徐向前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徐向前夹在中间，十分为难。陈昌浩和徐向前商量，决定由他带上电报，如实向党中央汇报。当晚，中央领导同志召集徐向前、陈昌浩在周恩来住处开会，针对张国焘的南下电令，以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7人的名义，电告张国焘，陈说南下之弊与北进之利，着其执行北进方针。张国焘9日复电，仍坚持南下。陈昌浩这时又改变了态度，同意执行张国焘的南下命令，徐向前不愿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也只好同意南下。

9月11日凌晨，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象，打电话问徐向前、陈昌浩：中央红军单独走了，还设警戒哨，我们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徐向前怎么办？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这就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过后，徐向前、陈昌浩根据张国焘的命令，率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再次穿越草地，开始了南下的进军。